

第四章

戰亂生活





發現佛光寺

從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七年七月盧溝橋事變爆發的這一段時間裡，林徽因除了熱心參與文學活動，勤奮地進行文學創作以外，還幾次外出對古建築進行大規模的考察，終於獲得了重要發現。

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八日，林徽因和梁思成等一行五人到達洛陽龍門石窟。這支只有五個人的考察小分隊，集中了中國古建築史研究的青年才俊，梁思成、林徽因、劉敦楨當時已是海內外知名的建築家。他們的學生陳明達、趙正之也已經在學界嶄露頭角。

在洛陽期間，他們的食宿之處非常骯髒，臭氣薰天，而且有「成千上萬的跳蚤」纏得人難以入睡。儘管環境惡劣，林徽因、梁思成等人還是堅持了下來，每天出去認真地進行考察。雖然人少，但他們的分工很細，很明確，劉敦楨負責洞窟編號和記錄建築特徵，林徽因考察佛像雕飾，梁思成、陳明達負責攝影，趙正之負責記錄銘刻年代。

一進入龍門，林徽因一行人就被石窟那博大雄偉的氣勢深深地震撼了。看到九尊很大的雕像以種種安詳而又富有表情的姿態盯著自己看時，林徽因「完全被只有在這種巨大的體驗中才會出現的威懾力給鎮住了」，「為藝術和人物景物的美和色彩所傾倒」，飲食住處的糟糕在罕有的精神體驗中得到了補償。

調查完龍門石窟之後，林徽因和梁思成等人又趕赴開封考察宋代的建築繁塔、鐵塔和龍塔等。之後，他們離開開封，抵達濟南與他們的學生麥儼增會合，然後驅車東進，到歷城、章丘、臨淄、益都、濰縣，接著又回濟南，再南下長青、泰安、慈陽、濟寧、鄒縣、滕縣等十一個縣，考察神通寺四門塔、辟之塔、慧宗塔、法定塔、興隆寺磚塔、鐵塔寺鐵塔、岱廟等古建築。

山東之行不僅積累了第一手的建築資料，也啟發了林徽因的藝術靈感。她一路走，一路寫詩，其中，有許多佳作為人所稱道，如〈山中〉：

紫色山頭抱住紅葉，將自己影射在山前，
人在小石橋上走過，渺小地追一點子想念。
高峰外雲在深藍天裡鑲白銀色的光轉，
用不著橋下黃葉，人在泉邊，才記起夏天！

也不因一個人孤獨地走路，路更蜿蜒，
短白牆房舍像蘆，仍蘆在山坳另一面，
只這丹紅集葉替代人記憶失落的層翠，
深淺團抱這同一個山頭，惆悵如薄層煙。

山中斜長條青影，如今紅蘿亂在四面，
百萬落葉火焰在尋覓山石荊草邊，
當時黃月下共坐天真的青年人情話，相信
那三兩句長短，星子般仍掛秋風裡不變。

這首詩形象細緻地刻畫出行走山中的感覺，心境與山境相和，美不勝收，而〈黃昏過泰山〉則表達了另一種心情〈黃昏過泰山〉：

記得那天
心同一條長河，
讓黃昏來臨，
月一片掛在胸襟。
如同這青黛山，
今天，
心是孤傲的屏障一面；

蔥鬱，
 不忘卻晚霞，
 蒼莽，
 卻聽腳下起風，
 來了夜——

詩歌以孤絕蒼莽的意象，寫出了自己行走在山河大地時的心情，令人叫絕。

雖行程不少，但林徽因對所考察的古建築不是很滿意。她說：「尤其是這幾天在建築方面非常失望，所謁大寺廟不是全垃圾，便是已代以清末簡陋的不相干的房子，邊刷著藍白色的『天下為公』及其他，變成機關或學校。每去一處都是汗流浹背地跋涉，走路工作的時候又總是早八至晚六最熱的時間裡。這三天來可真累得不亦樂乎。吃得也不好，天太熱也吃不下去。因此種種，我們比上星期的精神差多了。」

一九三七年，林徽因和梁思成應顧祝同的邀請到西安做小雁塔的維修計劃。他們乘坐鐵皮貨車前往，天氣非常寒冷，凍得人渾身發抖。西安的木結構建築幾乎都是清代以來重建的，但有大量唐代以來的磚石塔、經幢等，因而考察意義很大。他們著重考察了大、小雁塔，香積寺塔，深切地感受到了中國古建築所獨具的美以及其中所體現的民族風骨和文化內涵。

在此期間，林徽因、梁思成還北去耀縣，考察了藥王廟。按照原來的設想，他們還要西行到敦煌去考察莫高窟，但因為時局緊張等原因，沒有去成，這成為他們終身的遺憾。林徽因和梁思成雖然多次外出進行古建築的考察，但一直沒有發現唐代的木結構建築，年代最早的木結構建築只有初期調查的蔚縣獨樂寺、應縣木塔等遼宋時期的建築，這讓他們感到很遺憾。當時

日本人稱中國已經沒有了唐代木構建築，林徽因和梁思成對此一直抱懷疑態度，並且決意一定要找到唐代的木構建築。

林徽因和梁思成曾經讀過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圖錄》一書，那上面記載了五台山的佛光寺。然後他們又從北平圖書館《古清涼志》、《高僧傳》、《佛祖統計》等史料中查閱了有關佛光寺的記載。這座寺院創建於北魏時期，是五台山頗負盛名的大寺之一。唐武宗時，佛光寺被毀，十二年後，逃亡在外的該寺僧人願誠法師募資重建。由此推斷，如果保留至今，這應該是一處意義重大的唐代木構建築。因而，他們決定到五台山佛光寺去考察一番。

一九三七年六月，林徽因、梁思成和莫宗江、紀玉堂一起奔赴山西太原。在省府辦理旅行手續期間，他們到榆次去考察了那裡的雨花宮，兩天之後，他們又返回太原，前往五台山。他們騎驢進山，直奔南台外圍。由於山路依靠懸崖修建，崎嶇陡峭，他們不得不拉著毛驢爬山，這樣走了兩天，到了黃昏時分他們才到達佛光寺。雖然長途跋涉，他們都已經疲憊不堪，但是看到佛光寺大殿建築的形制特點時，他們便當即認定它是唐代的建築。這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這發現的驚喜將旅途的勞累一掃而光。

第二天，他們便開始對佛光寺進行全面的考察，經過七天緊張的工作後，終於確切考證出它建於唐大中十一年（公元八五七年）。這是林徽因和梁思成在中國古建築方面的重大發現，也是他們研究中國建築史的重要成就。

對於佛光寺年代的鑒定，林徽因起了關鍵作用。其中的細節，梁思成在《尋找古建築》中有詳細的記錄：

寺院是建立在山邊一處很高的台地上，面對著前面的天井，周圍有三十棵很老的松樹。它是一座很雄偉的建築物。總共只有一層高，它有巨大、堅固和簡潔的斗拱，超長的屋簷，一眼就能看出其年代之久遠。但它能比我們前此所發現的最老的木建築還要老嗎？

那高大的門登時就給我們打開了。裡面寬有七跨，在昏暗中顯得更加輝煌無比。在一個很大的平台上，有一尊菩薩的坐像，他的侍者們環他而立，猶如一座仙林。在平台左端，坐著一個真人大小的蒼便裝的女人，在仙人叢中，顯得非常渺小猥瑣。和尚們告訴我們，她就是篡位的武後。整個塑像群，儘管由於最近的裝修而顯得色彩鮮艷，無疑是晚唐時期的作品。但如果泥塑像是未經毀壞的原物，那麼庇蔭它的房屋必定也是原來的唐構。因為重修房子必定會損壞裡面的一切。

第二天開始了仔細的調查。斗木拱、梁架、藻井以及雕花的柱礎都細看過了。無論是單個或總體，它們都明白無誤地顯示了晚唐的特徵。但是我的最大驚喜是當我們爬進藻井上面的黑暗空間時產生的。我在那裡看到了一種屋頂架構，其做法據我所知只有在唐代繪畫中才有。使用雙「主椽」（借用現代屋頂架的術語），而不和「王柱」，這和後世中國建築的做法全然不同，大大出乎我們的意料。

這個「閣樓」裡住著好幾千隻蝙蝠，它們聚集在脊標上邊，就像厚厚的一層魚子醬一樣，這就使我無法找到在上面可能寫著的日期。除此之外，木材中又有千千萬萬吃蝙蝠血的臭蟲。我們站著的頂棚上部覆蓋著厚厚的一層塵土，可能是幾百年來積存的，不時還有蝙蝠的小屍體橫陳其間。

我們戴著厚厚的口罩掩蓋口鼻，在完全的黑暗和難耐的穢氣中好幾個小時地測量、畫圖和用閃光燈照相。當我們終於從屋簷下鑽出來呼吸新鮮空氣的時候，發現背包裡爬滿了千百隻臭蟲。我們自己也被咬得很厲害。可是我們的發現的重要性和意外收穫，使得這些日子成為我多年來尋找古建築中最快樂的時光。

原先大廳的牆上一定都有壁畫。但是唯一保存下來的建築的壁畫部分是「中楣」——過樑上邊和斗拱之間的膏泥部分。各部分的中楣繪畫水平各異，而且顯然是不同時期的作品。有一幅帶花邊的畫著一些菩薩，註明的日期相當於公元一一二二年。旁邊還有一幅，畫著一個菩薩和他的侍從，在日期上肯定更古老，藝術價值也更高。這一幅和敦煌石窟壁畫的相似性是最驚人的。它除了唐朝之外不可能是其它時期的作品。儘管只是一小塊牆皮，又在一個不顯眼的地方，但這是我所知道的在敦煌石窟以外中國本土唯一現存的唐代壁畫。

我們在大廳裡工作的第三天，我妻子在一根梁的根部下面注意到有中國墨的很淡的字跡。這個發現對我們大家的影響有如電擊一般。沒有比實際寫在廟的樑上或刻在石頭上的日期更讓人歡喜的東西了。那富麗堂皇的唐代建築已在面前——但我怎樣報道它的建造日期呢？唐朝從六一八年一直延續到九〇六年。現在這帶有淡淡字跡的木頭即將提供給我們盼望已久的答案。當我們大家忙著想辦法在佛像群中搭起腳手架以便清洗樑柱和就近審視題字時，我妻子徑直去工作了。她把頭盡量往後仰，從下邊各個不同角度盡力辨識樑上的文字。經過這樣的一番艱苦努力，她認出一些隱約的人名，還有長長的唐朝官職。其中最重要的是

最右邊的那根樑上，當時依然可辨的是：「佛殿主女弟子寧公遇」。施主是個女的！這位年輕的建築學家，本身是個女人，將成為第一個發現中國最希奇的古廟的人，而該廟的施主竟然也是個女人，顯然不是一個偶然的巧合。她生怕會由於生動的幻覺而誤識了不易辨識的字。但她記得她在外面台階前經幢石柱上看到過類似的帶官職的人名。她離開大殿，想去核實她在石柱上看到過的刻字。她大喜過望的發現，除了一大串官名以外，石柱上赫然寫著同樣句子：「佛殿主女弟子寧公遇」。石柱上刻的年代是「唐大中（大中為唐宣宗李忱年號——著者按）十一年」，相當於公元八五七年。

於是我們明白了：那個身著便裝，謙恭地坐在平台一端的女人，並不是像和尚們所說的是「武後」，而正是施主寧公遇夫人本人。

假定經幢石柱是在大殿建設後不久就豎起的，整個建築的日期就可以近似地確定。這比在此之前發現的最古的木結構還要早一百二十七年。這是我們這些年的搜尋中所遇到的唯一唐代木建築。不僅如此，在這同一座大殿裡，我們找到了唐代的繪畫、唐朝的書法、唐朝的雕塑和唐朝的建築。個別地說，它們是稀世之珍，但加在一起它們就是獨一無二的。

梁思成在文中稱林徽因為「第一個發現中國最稀奇的古廟的人」，實不為過。在考察的過程中，林徽因不畏艱難險阻，疲憊勞苦，以一種極其敬業的精神在人跡罕至的古老建築中搜尋考察，的確是後人學習的榜樣。

林徽因和梁思成等人對佛光寺整個建築群進行了測量，並作了拍照和詳細的記錄，然後把他們的發現寫成一份報告送給山西省當局。

結束了佛光寺的考察以後，他們又一路北上，看了靜靈寺、金閣寺、鎮海寺、南山寺，最後到了五台山縣最北端的秀麗山鎮台懷。但在這裡沒有發現什麼很有價值的古建築。下山之前，林徽因給讀小學三年級的女兒竇竇發了一封信，詳細地描述了他們上山下山的路線，並畫了一張地圖。離家越久，林徽因越是想念兒女。每次外出，她都要給女兒寫信，把旅途生活和考察結果告訴女兒，把一個八歲大的孩子當大人看待。

七月十五日，到達代縣之後，他們拿到一捆報紙。當打開來看時，一行刺目的標題出現在他們的眼前：「日軍猛烈攻擊我平郊據點」。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事變，全面侵華戰爭爆發。一路上的興奮，被迎頭潑了一盆冷水，大家的心情立刻沉重起來。早就預料到的民族災難終於發生了，他們決定立即趕回北平，但是平漢、津浦兩條鐵路已經不再通車，只能繞道返回。次日早晨，他們幾人從代縣出發，徒步到回蒲路中途的陽明堡，匆匆分手，各奔南北。林徽因、梁思成出雁門關，過大同、張家口，晝夜兼程，返回北平。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的爆發就已經表明日本妄圖侵吞中國的野心。到了一九三五年，日本已經在積極籌劃入侵華北，北平隨時都可能陷落。在這樣的危亡時刻，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著名高校開始做準備南遷的工作。

在這樣的局勢下，林徽因和梁思成明白，一旦北平陷落，他們將會陷入亡國奴的境地，那將是任何一位具有民族精神的中國人所不能忍受的。於是他們開始做有關的準備工作，一旦形勢緊急，也好逃難。對於他們來說，最重要的資料便是營造學社的建築材料，包括圖畫、照相底片、模型、研究筆記、檔案和圖書等。為了不使它們落入日本人的手中，林徽因和梁思成挑選、整理，燒掉一些，把最珍貴的資料打好包，送到一個安全的地方保存起來。同時他們也開始整理自己個人的東西。林徽因在給賁慰梅的信中說：「思成和我已經為整理舊文件和東西花費了好幾個鐘頭了。沿著生活的軌跡，居然積攢了這麼多的雜七雜八！看著這堆往事的遺存，它們建立在這麼多的人和這麼多的愛之中，而當前這些都正在受到威脅，真使我們的哀愁難以言表。特別是因為我們正淒慘地處在一片悲觀的氣氛之中，前途渺茫……」

但面對民族的災難，林徽因堅定而又沉著地說：「如果我們民族的災難來得特別迅猛而凶暴，我們也只能以這樣或那樣迅速而積極的方式去回應。當然會有困難和痛苦，但我們不會坐在這裡握著空拳，卻隨時讓人威脅著羞辱我們的『臉面』。」

事實上，林徽因也正是這麼做的。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間，天津《大公報》被日本人下令無限期停刊，並辦了一份所謂的《亞洲民報》來取代它。二十一日，林徽因接到該報的兩份報紙，並約她給該報的文藝副刊寫稿。面對這種民族恥辱，林徽因感到非常憤怒，立即把報紙扔進火爐，燒成灰燼，而且寫信給沈從文說：

怎麼了？大公報到底被收拾，真叫人生氣！有辦法否？

昨晚我們這裡忽收到兩份怪報，名叫「亞洲民報」，篇幅大極，似乎內中還有文藝副刊，是大規模的組織，且有計劃地，看情形似乎要大公報永遠關門。氣糊塗了我！我只希望是我神經過敏。社論看了叫人毛髮能倒豎。

從這些可以看出，林徽因深明民族大義，在民族氣節上毫不含糊。

一九三七年七月回到北平之後，北平的戰事還僵持著，中國方面正企圖與日本進行談判，提出「和平解決」的論調，因而北平暫時還沒有被佔領。看到國民黨軍隊在挖戰壕，準備打仗，林徽因在給女兒的信中說：「如果日本人要來佔北平，我們都願意打仗……我覺得我們現在做中國人應該要頂勇敢，什麼都不怕，什麼都頂有決心才好。不怕打仗，更不怕日本。」面對日本侵略者，林徽因毫不畏懼，大義凜然。同時，他們預感到北平不久有可能失守，既然不打算做異族的順民，他們便積極做好逃難的準備。林徽因和梁思成把他們最珍貴的建築資料打包存到天津英租界的英資銀行保險庫中存放，以免落入日本人的手中，同時，家裡的東西一些燒掉，一些賣掉或者送人。

很快，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和平解決」的論調就破產了。雖然遇到了頑強的抵抗，但日本侵略者在七月二十九日就佔領了北平。到了九月，梁思成收到了署名「東亞共榮協會」的請柬，邀請他參加改協會的會議，顯然，作為北平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梁思成已經被日本人注意到了。他們妄圖利用他在文化界的地位、名聲，籠絡一批毫無民族氣節的人，來維持日本在北平的統治，為他們的侵略行徑服務。林徽因、梁思成意識到了問題

的嚴重性，若繼續留在北平，不是以身殉國，便是做亡國奴。他們決定立即離開北平，儘管這時醫生警告林徽因她的病情承受不了顛簸流離之苦，但林徽因認為「我的壽命是由天的了」。

一九三七年九月五日，林徽因、梁思成及其家人離開北平去往天津，走上了逃難的第一站。他們一行除了兩個孩子和林徽因的母親外，還有老金和清華大學的兩位教授。到達天津後，他們接著乘船到青島，再經過濟南、鄭州、漢口，到達長沙。臨從天津走之前，梁思成留給費慰梅一封信說：「發生了這麼多事，我們都不知道從何說起。總之我們都平安，一個星期前我們抵達天津，打算坐船到青島，從那裡途經濟南，去到換車船不超過五次的地方——最好是長沙，而這期間盡可能不要遇上空襲。等到戰爭打贏了，我們就可以結束逃難生涯。」

老金後來描述這次逃難旅行：「一路上沒出什麼大岔子，不過有麻煩已經夠難應付了。我們繞來轉去到了漢口，最後總算到達長沙已是十月一日了。聯合大學十一月一日開學。」

林徽因本來身體就不好，加上一路顛沛流離，疲憊不堪。剛剛抵達長沙，她就患腹瀉，非常痛苦。休息幾天後，他們租到了火車站旁的一家樓上的三間房作為棲身之地。住下之後，林徽因家裡還是保留了在北平時朋友在一起聚會的習慣。她說：「一到晚上，你會遇到一些從前在北平每星期六聚會的朋友們在這兒那兒閒逛，到婦孺來此地共赴『國難』的家宅裡尋找一些家庭的溫暖。在轟炸之前，我們仍舊在一起聚餐，不是到飯館去，而是享用我在那三間房子裡的小爐子上的烹飪，這三間房子裡，我們實際上做著以前在整個北總布胡同三號做的一切事情。」但是逃難的生活也給她帶來很多煩惱。她說：「我是女人，當然立刻變成純淨的『糟糠』的典型……烹調、課子、洗衣、鋪床，每日如在走馬燈中過去。」

當時長沙的局勢也很緊張，在這個有大批難民湧來的城市，空襲警報時常讓人心驚肉跳地響起，儘管到十一月二十四日為止，一個炸彈也沒有掉下來過，但是急匆匆地逃到地下室或防空洞中，已經成為家常便飯。然而，有一天由於疏忽，沒有拉警報，飛機卻已經飛到頭上來了。林徽因在信中向費慰梅描述那次驚心動魄的空襲：

長沙第一次遭到空襲時，我們的住宅差不多是直接被一顆炸彈命中。炸彈落在離住宅大門十五碼的地方，我們在這所住宅裡有三間房子，作為我們臨時的家。當時我們都在家——外婆、兩個孩子、思成和我。兩個孩子都有病躺在床上。誰也不知道我們是怎樣逃脫被炸成碎片的厄運的。當我們聽見先扔下來離我們較遠的兩顆炸彈的可怕炸裂和轟鳴聲以後衝下樓梯時，我們的房子已經垮了。出於奇特的本能，我們兩人一人抓起一個孩子就奔向樓梯。但我們還沒有到達地面，近處那顆炸彈就響了。我抱著小弟（兒子）被炸飛了又摔到地上，卻沒有受傷。同時房子就開始裂開，那大部分是玻璃的門窗啦、房頂啦、天花板啦，全都倒下來雨點般地落到我們身上。我們從旁門衝出去，到了黑煙噎人的街上。

當我們向聯大的防空洞跑去的時候，另一架轟炸機正在下降。我們停止奔跑，心想這次跑不掉了，倒不如大家要死在一起，省得孤零零地活著受罪。這最後的一顆炸彈沒有爆炸，而是落在我們在跑著的那條街的盡頭。我們的東西（現在已經很少了）都從玻璃垃圾堆裡掘出來了，現在我們就在這兒那兒的朋友家暫住。

經歷了這次空襲，林徽因說：「我們的國家還沒有組織到可使我們對戰爭有所效力的程度，以致至今我們還只是『戰爭累

贅」而已。既然如此，何不騰出地方，到更遠的角落裡去呢。有朝一日連那地方（指昆明——作者注）也會被轟炸的，但眼下也沒有更好的地方可去了。」

但林徽因並沒有因此感到氣餒和絕望，她給沈從文的信中說：

說到打仗你別過於悲觀，我們還許要吃苦，可是我們不能不爭到一種翻身的地步。我們這種人太無用了，也許會死會消滅，可是總有別的法子。我們中國國家進步了弄得好一點，爭出一種新的局面，不再是低著頭地被壓迫著，我們根據事實時有時很難樂觀，但是往大處看，抓緊信心，我相信我們大家根本還是樂觀的，你說對不對？

長沙是不能再待下去了。「我們又收拾行李了，要搭汽車走十天艱難的旅程到雲南去。」林徽因寫道，「除了那些已經在這兒的人以外，每一個我們認識的人和他們的家人，各自星散，不知流落何方。」

林徽因他們親愛的家人之一「老金」這時和他們走散了。老金和清華大學的師生們住在長沙郊區南嶽的臨時大學。他一個星期以後才得知長沙被炸的消息，而當梁家啟程前往昆明的五個星期之後，他還留在湖南。他說：「我離開了梁家就跟掉了魂似的。」

十二月八日，林徽因、梁思成帶著母親和孩子乘坐一輛超載的大巴前往昆明。到達湘西時，林徽因看到了沈從文筆下的秀麗風景，山勢奇偉，河水碧透，處處青氣逼人。她說：「如果不是在這戰期中時時心裡負著一種悲傷哀愁的話，這旅行真是不知幾世修來的。」尤其是到了沅陵以後，景色越是美不勝收，林徽因禁不住想，沈從文的小說真不是憑空想出來的，這裡說不定真的住著一位像《邊城》裡的翠翠一樣可愛的姑娘。

到達貴州晃縣時，他們本來就充滿驚險的旅途遇上了更大的麻煩。有關當局為了遷走空軍學校的學院和機器，把過往的所有大汽車都攔截下來徵用了，林徽因一家所乘的那輛也不例外，沒有別的辦法，他們只好滯留晃縣。

然而在這個關鍵時刻，林徽因病倒了，她得了嚴重的支氣管炎，而且很快轉為肺炎，高燒四十多度，城裡骯髒的小旅館裡住滿了逃難的人。他們真是連避風遮雨的地方都找不到，一家人憂心忡忡地在黑暗而泥濘的路上走著。這時，忽然一家旅館裡傳出悠揚的琴聲，「這拉琴的人一定是來自北平或上海。」梁思成想，接著，他敲了敲門。門開了，他看見一屋子空軍航校的學員，他們正等車到昆明去，他把處境告訴了他們，太太病得很嚴重，卻找不到一個歇腳的地方。這群年輕的空軍學員們馬上張開手，歡迎他們一家。他們擠了又擠，硬是騰出一塊地方來給梁家住。

奇蹟還不只如此，大約百來個困在這裡等車的外地人當中，有一位女醫生，她曾在日本的一所美國教會醫院受過訓練，又曾研究過中草藥，她給林徽因吃了一些根據西醫處方而在當地能買到的中藥。就這樣，林徽因在「那間用一塊薄板與那些可愛的年輕廣東飛行員，可憎的當地妓女，罵罵咧咧的賭棍，口操山東方言的軍官和來自各地、氣質各異的司機們隔開的小屋子裡」躺了兩個星期，而「那些司機八成是和那旅館裡的妓女賭博和喝酒，以便第二天在危險的路途上開車有足夠的精力」。這段時間裡，梁思成教孩子們怎樣看地圖，帶他們到河邊散步，用石頭打「水漂兒」給他們看，以消磨這難耐的時光。

在這艱難的旅途中，林徽因梁思成夫婦開始和八位空軍學員結下親密的友誼。後來，學員們到昆明進行最後訓練，晉陞為飛行員執勤時，他們依舊保持聯繫。學員們的父母都在淪陷區，

所以把梁家當成自己的家，而林徽因夫婦也把他們當成自己的小弟弟一樣看待。兩週之後，林徽因好不容易退燒。一家又搭上一輛十六個座的小公共汽車，往昆明進發。

林徽因寫道：「我們在令人絕望的情況下又重新上路。每天凌晨一點，摸黑搶著把我們少得可憐的行李和我們自己塞進長途汽車，到早上這輛汽車終於出發時，已經擠上二十七名旅客。這是個沒有窗子、沒有點火器、樣樣都沒有的玩意兒，喘著粗氣、搖搖晃晃、連一段平路都爬不動，更不用說又陡又險的山路了。」

天黑下來時，林徽因的母親又發冷又怕熱，渾身難受，但沒有退路，只能坐著這輛破車前進。深夜，他們的車在以土匪出沒著稱的「七十二盤」頂上突然拋錨——沒有汽油了，拉著孩子們凍僵了的小手，全家人摸黑走了一段山路，林徽因說：「又一次，奇蹟般地，我們來到峭壁邊上的一片房子，讓我們進去過夜……」

目的地還很遙遠，林徽因給費慰梅的信中寫道：「此後，又有關於這些破車、意外的拋錨、臭烘烘的小客棧等等的一個又一個插曲。間或面對壯麗的風景，使人比任何時候都更加心疼。玉帶般的山澗、秋山的紅葉和發白的茅草，飄動著的白雲、古老的鐵索橋、渡船，以及地道的中國小城，這些我真想仔細地一樁樁告訴你，可能的話，還要注上我自己情緒上的特殊反應。」

經過千難萬險，一九三八年一月中旬，林徽因、梁思成一家終於抵達昆明。他們在長沙坐上汽車準備進行的「十天艱難的旅途」，實際上花了差不多六個星期。





溫暖的昆明

林徽因和梁思成到達昆明以後，住在翠湖巡律街前市長的宅院裡。

作為抗戰的大後方，一向安靜的昆明由於突然而來的人群顯得非常熱鬧。大街上風塵僕僕的來客隨處可見，他們終於可以在這個風景如畫、氣候溫暖的地方休息一下了。

林徽因家住的地方離昆明著名的風景地翠湖很近。翠湖位於昆明市五華山西麓，是一個風景優美的公園。面積雖然不算大，但滿湖都是荷花、游魚、楊柳、樓台，清風徐來，水光潑灑，柳枝飄蕩，空氣清新，是很好的遊覽休息的地方。

林徽因、梁思成來到昆明以後，經常帶兒女來翠湖遊玩，看波光樹影，藍天白雲。在戰爭的大後方，經過了無數艱險，他們終於可以鬆一口氣了，孩子們的成長也讓她感到欣慰。林徽因描述孩子的情形時說：「寶寶常帶著一副女孩子的爛靜笑容，出落得越來越標緻。而小弟結實又調皮，一對睜得大大的眼睛，他正是我所期望的男孩子。天生像個藝術家，能畫出一些飛機、高射炮、戰車和其他許許多多的軍事武器。」

但是，這種難得的好日子並不長，他們很快就面臨沉重的生活壓力。由於物價上漲，林徽因和梁思成為了維持起碼的生活，只好靠他們的建築師的技能，開始「打工」，為那些「卑鄙的富人和奸商」設計房子。他們的僱主是一批可憎的傢伙，而且報酬很不穩定，但為了生存，他們只好忍受。但是，就連這種生活也沒有維持長久，由於勞累過度，梁思成病倒了，患了嚴重的脊椎關節炎和肌肉痙攣，被迫臥床養病。

剛開始醫生診斷他是扁桃體發炎，把扁桃體切除了，可是接著，梁思成又牙周炎發作，於是又把滿口牙齒拔掉，因為這一系列

的折騰，這一年，梁思成一直躺在一張帆布椅上，服藥治病。為了少服那些止痛藥，以免中毒，醫生勸他幹點手工工作以轉移注意力，減輕疼痛，於是梁思成經常找些舊毛衣之類的東西來拆織。由此以來，林徽因不但要忙家務，挑起整個家庭的重擔，還要照顧臥病在床的梁思成，生活辛苦至極。加上糧價暴漲，林徽因不得不找兼職工作。她在雲南大學找了份工作，每週教六個鐘頭的英文補習，但月薪只有四十多塊法幣，而為了這些錢，她每週要爬四次山坡，走很遠的土路。

此外，他們還被一些無聊的應酬所煩擾。由於梁思成、林徽因都是一代名人的後代，而且在文化界頗有名氣，因此，昆明的上流社會很是看中他們的身分和聲望，經常宴請他們以給自己裝點門面。這對於林徽因、梁思成來說是一種非常痛苦的折磨，林徽因說，「常常有些闊綽的應酬需要我們笑臉應付」，自己好像是做了「社會性的騙子」，「情感良心均不得平衡」。尤其是當她想到「天天早上那些熱血的人在我們上空練習速度驅逐和格鬥，底下芸芸眾生仍然有些講究」時，便覺得「十三分對不起那些在天上冒險的青年」。

儘管生活艱難，但林徽因的精神狀態還算不錯。有一種堅定的信念支持著她，那就是中國人民肯定能打敗日本侵略者，因而，無論生活讓人感到多麼沮喪，她都積極地去面對。她在給沈從文的信中說：「隴海全線的激戰使我十分興奮，那一帶地方我比較熟悉，整個心都像在那上面滾，有許多人似乎看那些新聞印象裡只有一堆內地縣名根本不發生感應，我就奇怪！我真想在山西隨軍。」

到了一九三八年左右，讓林徽因感到高興的是，張奚若、金岳霖、楊振聲、沈從文、蕭乾等老朋友都陸續來到了昆明。而且，張奚若夫婦就住在林徽因家旁邊，沈從文、金岳霖、楊振聲他

們組成的大家庭住得離林徽因、梁思成也不遠。這些北平文化界的名人同聲相應的朋友們，又很快像在北平時那樣，常常在一起聚會，談論戰事、文學、政治、社會等等。這樣的聚會，帶給林徽因很多精神上的愉悅，減輕了她的精神負擔，是一種極好的安慰。她在給費慰梅的信中說：「我喜歡聽老金和奚若笑，這多少幫助了我忍受這場戰爭。從這裡可以看出，我們畢竟還是同一類人。」

不久，老金也在信中談到了他們在一起的情況，他說：「如果你們也在這裡，在這陌生環境裡，你們會看到不少熟面孔。有些人身上穿的是唯一的一套西裝或一件長袍，箱子裡什麼也沒有。另外一些人能夠找到合住的房子。張奚若一家比我先來。中研院的人也快來了。梁思成和李濟這幾天內就能到達，趙元任已經來了好幾天。我想這裡像在長沙一樣，將會有某種微型的北京生活，只是在物質上是極匱乏的。只有天氣例外。太陽非常明媚，正如徽因昨天對我說的，有些地方很像義大利。」

說到林徽因，在久別之後他形容她：「依然那麼迷人、活潑、表情生動和光彩照人——我簡直想不出更多的詞彙來形容她。唯一的區別是，她不再有很多機會滔滔不絕地講話和說笑，因為在國家目前的狀況下，實在沒有多少可以講的，也沒有什麼值得笑的。」

最後金岳霖說：「實際上，我們多少有點心灰意冷。我們的心中藏著一些沒有表現出來的思念、希望和焦慮，這些東西用不著表現出來，因為人人都知道它的存在，有一股暗潮洶湧，表面上我們只關心像房子、食物一類生活瑣事。對聯大的人來說，目前的問題在於大學的校址，直到現在還定不下來。有許多人為障礙和物質困難。想要維持中國的高等教育並非易事，不過我想我們總會成功的。」

在昆明，還有一件讓林徽因一家感到高興的事。在貴州晃縣邂逅的那八位空軍航校飛行員，每到休息日，總愛到他們家裡來玩，把林徽因當做大姐，訴說自己心中的苦悶。他們在學成畢業時，邀請林徽因和梁思成作為他們的「名譽家長」參加畢業典禮，在戰爭的特殊年代，林徽因和他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林徽因說：

這八個孩子士氣很高、心地單純，對我們的國家和這場戰爭抱著直接和簡單的信心，他們的身體都健康得叫人羨慕。他們所受的訓練就是讓他們在需要時能夠不假思索使用自己的技能並獻出自己的生命。

不知怎麼，他們以一種天真的孩子氣依戀著我們。我們之間產生了很深的親情。他們來看我們或給我們寫信，好像是他們的家裡人。其中很多人去了前線，有的則在昆明保衛著我們的生命。有一位我告訴過你的，小提琴拉得很好，人特別可愛。最近決定要結婚了。不要問我如果他結了婚又出了事，他的女朋友會怎樣。我們就是無法回答這類問題。

可是在抗戰中，這批飛行員一個個在與日軍的空戰中犧牲了，沒有一個人倖免。他們陣亡後，遺物寄到林徽因家裡來，每次看到這些遺物，林徽因都要痛哭一場。

雖然有時會有空襲警報，但這時昆明的形勢還算安寧。在短暫的空間時間，林徽因又拿起筆，從事她的詩歌創作。多年之後，逃難昆明的人也許會記得許多昆明的事物，比如翠湖，比如昆明溫暖的氣候，當然，還有昆明的茶館。在抗戰時期的昆明，茶館給許多逃難的人帶來些許溫暖。那是一個可以讓人暫時忘卻戰爭，享受片刻寧靜的地方。林徽因在詩歌〈茶鋪〉中描繪茶館裡的景象：

這是立體的構畫，
描在這裡許多樣臉
在順城腳的茶鋪裡
隱隱起喧騰聲一片。

各種的姿勢，生活
刻畫著不同方面：
茶座上全坐滿了，笑的，
皺眉的，有的抽著旱煙。

老的，慈祥的面紋，
年輕的，靈活的眼睛，
都暫要時間茶杯上
停住，不再去擾亂心情！

一天一整串辛苦，
此刻才賺回小把安靜，
夜晚回家，還有遠路，
白天，誰有功夫閒看雲影？

不都為著真的口渴，
四面窗開著，喝茶，
蹺起膝蓋的是疲乏，
赤著臂膀好同鄉鄰閒話。
也為了放下扁擔同肩背，
向運命喘息，倚著牆，
每晚靠這一碗茶的生趣，
幽默估量生的短長……

這是立體的構畫，
設色在小生活旁邊，
陰涼南瓜棚下茶鋪
熱鬧照樣地又過了一天！

經歷了戰時的大遷移，對中國大地上的風土人情有了進一步的瞭解，對中國的現實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以後，林徽因的詩風變得凝重、樸實，但又不乏靈動的詩意。除了〈茶鋪〉外，〈小樓〉也具有同樣的風格：

張大爹臨街的矮樓，
半藏著，半挺著，立在街頭，
瓦覆著它，窗開一條縫，
夕陽染紅它，如寫下古遠的夢。

矮簷上長點草，也結過小瓜，
破石子路在樓前，無人種花，
是老罈子，瓦罐，大小的相伴；
塵垢列出許多風趣的凌亂。

但張大爹走過，不吟詠它好；
大爹自己（上年紀了）不相惜古老。
他拐著杖常到隔壁沽酒，
寧願過橋，土堤去看新柳！

一九三九年初，昆明不斷受到日本侵略者飛機的空襲，不再是安寧之地。林徽因、梁思成把家搬到郊區龍泉鎮的麥地村，隨同他們一道而來的有營造學社的同仁。營造學社的莫宗江、陳明達、劉致平於一九三八年初便來到昆明，不久後劉敦楨也來了，於是營造學社又重新組建起來，得到了中美庚款基金會的

補助，而且依附於中央研究院語言歷史研究所。他們租了一個舊尼姑庵作工作室。林徽因一家住在大殿旁的小屋裡，學社的其他成員和眷屬也住在這座尼姑庵裡。

這年秋天，梁思成的病基本上治好了，恢復了健康，他便和劉敦楨、莫宗江、陳明達一起，對雲南、四川、陝西、西康等省的三十六個縣做了為期半年的古建築考察，林徽因則留下，負責整理資料工作。

就是在昆明鄉下這種相對安寧的環境中，林徽因回顧抗戰以來的經歷，寫了〈彼此〉一文：

朋友又見面了，點點頭笑笑，彼此曉得這一年不比往年，彼此是同增了許多經驗。個別地說，這時間中每一個人的經歷難都有特殊的形相，含著特殊的滋味，需要個別的情緒來分析來描述。

綜合地說，這許多經驗卻是一整片彷彿同式同色，同大小，同份量的迷惘。你觸著那一角，我碰上這一頭，歸根還是那一片迷惘籠罩著彼此。七月！——這兩字就如同史歌的開頭那麼有勁——八月，九月帶來了那狂風，後來，後來過了年，——那無法忘記的除夕！又是那一月，二月，三月，到了七月，再接再厲地又到了年夜。現在又是一月二月再開始……誰記得最清楚，這串日子是怎樣地延續下來，生活如何地變？想來彼此都不會記得過分清晰，一切都似乎在迷離中旋轉，但誰又會忘掉那麼切膚的重重憂患的網膜？

經過炮火或流浪的洗禮，變換又變換的日月，難道彼此臉上沒有一點記載這經驗的痕跡？但是當整一片國土縱橫著

剝痕，大家都是「離散而相失……去故鄉而就遠」，自然「心嬋媛而傷懷兮，眇不知其所馳」，臉上所刻那幾道並不使彼此驚訝，所以還只是笑皺。口角邊常添幾道酸甜的紋路，可以幫助彼此咀嚼生活。何不默認這一點：在迷惘中人最應該有笑，這種的笑，雖然是斂住神經，斂住肌肉，僅是毅力的後背，它卻是必需的，如同保護色對於許多生物，是必需的一樣。

那一晚在××江心，某一來船的甲板上，熱臭的人叢中，他記起他那時的困頓飢渴和狼狽，旋繞他頭上的卻是那真是倒如同幻象，幻象又成了真實的狂敵殺人的工具，敏捷而近代型的飛機：美麗得像魚像鳥……這裡黯然的一掬笑是必需的，因為同樣的另外一個人懂得那原始的驟然喚起純筋肉反射作用的恐怖。他也正在想那時他在××車站台上露宿，天上有月，左右有人，零落如同被風雨摧落後的落葉，發索地蜷伏著，他們心裡都在回味那一天他們所初次嘗到的敵機的轟炸！談話就可以這樣無限制的延長，因為現在都這樣的記憶，——比這樣更辛辣苦楚的——在各人心裡真是太多了！隨便提起一個地名大家所熟悉的都會或商埠，隨著全會湧起怎樣的一個最後印象！

再說初入一個陌生城市的一天，——這經驗現在又多普遍——尤其是在夜間，這裡就把個別的情形和感觸除外，在大家心底曾留下的還不是一劑彼此都熟識的清涼散？苦裡帶澀，那滋味侵入脾胃時，小小的冷熾會輕輕的背脊上爬過，用不著絲毫銳性的感傷！也許他可以說他在那夜進入某某城內時，看到一列小店門前淒惶的燈，黃黃的發出奇異的暈光，使他嗓子裡如梗著刺，感到一種發緊的觸覺。你所記得的卻是某一號車站後面黯白的煤氣燈射到陌

生的街心裡，使你心裡好像失落了什麼。那陌生的城市，在地圖上指出時，你所經過的同他所經過的也可以有極大的距離，你同他當時的情形也可以完全的不相同。但是在這裡，個別的異同似乎非常之不相干；相干的僅是你我會彼此點頭，彼此會意，於是也會彼此地笑笑。

七月在蘆溝橋與敵人開火以後，縱橫中國土地上的腳印密密地銜接起來，更增加了中國地域廣漠的證據。每個人參加過這廣漠地面上流轉的大韻律的，對於塵土和血，兩件在尋常不多為人所理會的，極尋常的天然質素，現在每人在他個別的角上，對它們都發生了莫大親切的認識。每一寸土，每一滴血，這種話，已是可接觸，可把持的十分真實的事物，不僅是一句話一個「概念」而已。

在前線的前線，興奮和疲勞已摻拌著塵土和血另成一種生活的形體魂魄。睡與醒中間，饑與食中間，生和死中間，距離短得幾乎不存在！生活只是一股力，死亡一片沉默的恨，事情簡單得無可再簡單。尚在生存著的，繼續著是力，死去的也繼續著堆積成更大的恨。恨又生力，力又變恨，惘惘地卻勇敢地循環著，其他一切則全是懸在這兩者中間悲壯熱烈地穿插。

在後方，事情卻沒有如此簡單，生活仍然緩馳地伸縮著；食宿生死間距離恰像黃昏長影，長長的，盡向前引伸，像要撲入夜色，同夜溶成一片模糊。在日夜寬泛的循環裡於是穿插反更多了，真是天地無窮，人生長勤。生之穿插零亂而瑣屑，完全無特殊的色澤或輪廓，更不必說英雄氣息壯烈成分。斑斑點點僅像小血銹凝在生活上，在你最不經意中烙印生活。如果你有志不讓生活在小小處窳敗，逐漸

減損，由銳而鈍，由張而弛，你就得更感謝那許多極乎常而瑣碎的摩擦，無日無夜地透過你的神經，肌肉或意識。這種時候，歎息是懸起了，因一切雖然細小，卻絕非從前所熟識的感傷。每件經驗都有它粗壯的真實，沒有歎息的餘地。口邊那酸甜的紋路是實際哀樂所刻畫而成，是一種堅忍性的笑。因為生活既不是簡單的火焰時，它本身是很沉重，需要韌性的支持，需要產生這韌性支持的力量。現在後方的問題，是這種力量的源泉在哪裡？決不憑著平日均衡的理智，——那是不夠的，天知道！尤其是在這時候，情感就在皮膚底下「踴躍其若湯」，似乎它所需要的是超理智的衝動！現在後方被緩的生活，緊的情感，兩面摩擦得愁鬱無快，居感感而不可解，每個人都可以苦惱而又熱情地唱「終長夜之漫漫兮，掩此哀而不去」，或「寧溘死而流亡兮，不忍為此之常愁！」支持這日子的主力在哪裡呢？你我生死，就不檢討它的意義以自大。也還需要一點結實的憑借才好。

我認得有個人，很尋常地過著國難日子的尋常人，寫信給他朋友說，他的嗓子雖然總是那麼乾啞，他卻要啞著嗓子私下告訴他的朋友：他感到無論如何在這時候，他為這可愛的老國家帶著血活著，或流著血或不流著血死去，他都覺到榮耀，異於尋常的，他現在對於生和死都必然感到滿足。這話或許可以在許多心弦上叩起迴響，我常思索這簡單樸實的情感是從哪裡來的。信念？像一道泉流透過意識，我開始明瞭理智同熱血的衝動以外，還有個純真的力量的出處。信心產生力量，又可儲蓄力量。

信仰坐在我們中間多少時候了，你我可曾覺察到？信仰所給予我們的力量不也正是那堅忍韌性的倔強？我們都相

信，我們只要都為它忠貞地活著或死去，我們的大國家自會永遠地向前邁進，由一個時代到另一個時代。我們在這生是如此艱難，死是這樣容易的時候，彼此仍會微笑點頭的緣故也就在這裡吧？現在生活既這樣的彼此患難同味，這信心自是，我們此時最主要的聯繫，不信你問他為什麼仍這樣硬朗地活著，他的回答自然也是你的回答，如果他也問你。

信仰坐在我們中間多少時候了？那理智熱情都不能代替的信心！

思索時許多事，在思流的過程中，總是那麼晦澀，明瞭時自己都好笑所想到的是那麼簡單明顯的事實！此時我拭下額汗，差不多可以意識到自己口邊的紋路，我尊重著那酸甜的笑，因為我明白起來，它是力量。

話不用再說了，現在一切都是這麼彼此，這麼共同，個別的情緒這麼不相干。當前的艱苦不是個別的，而是普遍的，充滿整一個民族，整一個時代！我們今天所叫做生活的，過後它便是歷史。客觀的無疑我們彼此所熟識的艱苦正在展開一個大時代。所以別忽略了我們現在彼此地點點頭。且最好讓我們共同酸甜的笑紋，有力地，堅韌地，橫過歷史。

林徽因回顧了抗戰以來大家所經歷的艱難波折，但通篇沒有絲毫消極低沉的情緒，而是以十分堅毅的姿態和無可替代的信心，去面對個人和國家的苦難，相信可以「有力地，堅韌地，橫過歷史」。我們從中可以看到一個民族在災難來臨時所爆發的力量。

一九四〇年春天，為了躲避轟炸，梁思成、林徽因不得不又一次搬家。他們在距昆明十二公里遠的小村莊龍頭村，共同設計了自己的三間住宅，樣式跟當地農民的房子一樣。後來，金岳霖又在旁邊添了一間「耳房」，作為自己的住所。為了這幾間房子，林徽因操盡了心，也花光了家裡的錢。她在給費慰梅的信中說：

出乎意料地，這座房子花了比原先告訴我們的高三倍的錢。所以把我們原來就不多的積蓄都耗盡了，使思成處在一個可笑的窘境之中（我想這種表達方式大概不對頭）。在建房的最後階段事情變得有些滑稽……我們的房子是最晚建成的，以至最後不得不為爭取每一塊木板、每一塊磚，乃至每根釘子而奮鬥。為了能夠遷入這個甚至不足以「蔽風雨」——這是中國的經典定義，你們想必聽過思成的講演——屋頂之下，我們得親自幫忙運料，做木工和泥瓦匠。……

現在我們已經完全破產，比任何時候都慘。米價已經漲到一百塊錢一袋，我們來的時候才三塊四。其他東西的漲幅也差不多。今年我們做的事沒有一件輕鬆。我把我們在做什麼和我們的景況告訴你們，很不好意思。思成到四川已經去了五個月。我一直病得很厲害，到現在還沒好。

儘管費慰梅、費正清經常從美國寄來支票，但是常常派不上用場，因為很多東西他們在當地都買不到，但蓋房子的時候，一九四〇年九月費慰梅寄來的支票卻幫了大忙，正好支付了建築費用。

林徽因一家的生活是艱難的，在這兒，他們買回的第一件重要傢俱是一個大水缸，近一公尺高，用來儲存挑回來的水。燒飯

在一個三條腿的火盆上進行，燃料是用煤灰和泥做成的煤球。至於食物，則必須走很遠的路頂著灰塵到村子裡去買，而且要天天去，沒有電話，也沒有交通工具，天黑了點菜籽油燈，但那也很貴，最節省的辦法就是天一黑就睡覺。孩子的衣服穿破了或穿不下，就不知怎麼辦才好，因為布幾乎買不到，戰爭、通貨膨脹，已經使林徽因一家過著農民一樣艱苦的生活。

為了這淒慘的生活，為了堅持下去，也為了日後的工作，林徽因拼盡全力支撐著。老金曾用兩句話，來概括他對林徽因這段時期的生活的看法：「她仍舊很忙，只是在這種鬧哄哄的日子裡更忙了。實際上她真是沒有什麼時間可以浪費，以致她有浪費掉生命的危險。」

梁思成在離家六個月後回來，林徽因在信上描述他們的家：「我們正在一座新建的三房農舍中安頓下來。它位於昆明市東北十二公里處一個小村邊上，風景優美而沒有軍事目標。鄰接一條長堤，堤上長滿如古畫中的那種高大筆直的松樹。我們的房子有三個大一點的房間，一間原則上歸我用的廚房和一間空著的傭人房，因為不能保證這幾個月都能用上傭人。這個春天，老金在我們房子的一邊添蓋了一間「耳房」。這樣，整個北總布胡同集團就原封不動地搬到了這裡，可天知道能維持多久。」「這房子，有些方面，」林徽因說，「也頗有些美觀和舒適的地方。我們甚至有時候還挺喜歡它呢。」這是兩位建築師唯一為自己設計的房子。

離林徽因家不遠，在一條水渠那邊，有一個燒製陶器的小村——瓦窯村。林徽因經常到那半原始的作坊裡去看老師傅做陶坯，常常一看就是幾個小時，然後沿著長著高高的松樹的長堤，在黃昏中慢慢走回家。她對工藝美術歷來十分傾心，她後來常對家人說，那老工人手下曾變化出過多少奇妙的造型，可

惜變來變去，最後不是成為瓦盆，就是變做痰盂。

昆明的景色十分迷人，然而在戰爭的陰雲籠罩下，所有的這一切都顯得那麼短暫和難得。林徽因說：

天氣開始轉冷，天空佈滿愈來愈多的秋天的泛光，景色迷人。空氣中飄滿野花香——久已忘卻的無數最美好的感覺之一。每天早晨和黃昏，太陽從那奇詭的方位帶來靜穆而優美的快感，偷偷射進這個充滿混亂和災難的無望的世界裡，人們仍然意識到安靜和美的那種痛苦的感覺之中。戰爭，特別是我們自己的這場戰爭，正在前所未有地陰森森地逼近我們，逼近我們的皮肉、心靈和神經。

到十一月，林徽因在給賁慰梅的信中說，轟炸已經越來越厲害：

日本鬼子的轟炸或殲擊機的掃射都像是一陣暴雨。你只能咬緊牙關挺過去，在頭頂還是在遠處都一樣，有一種讓人嘔吐的感覺，尤其是當一個人還沒有吃過東西，而且今天很久都不會再吃任何東西，就是那種感覺。

可憐的老金，每天早晨在城裡有課，常常要在早上五點半從這個村子出發，而還沒有來得及上課空襲就開始了，然後就得跟著一群人奔向另一個方向的另一座城門、另一座小山，直到下午五點半，再繞許多路回這個村子，一天沒吃、沒喝、沒工作、沒休息，什麼都沒有！這就是生活。

十一月的轟炸加劇，迫使林徽因一家離開他們溫暖的小屋，離開親愛的朋友，再來一次大遷移。梁思成從四川回來就被任命為中央研究院研究員，而營造學社董事長周詒春博士，提名梁思成為學社社長，並將學社附屬於政府所支持的，中研院下的

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央研究院是由教育部領導的，教育部下令中研院各所從昆明遷往四川重慶西邊大約三百五十公里，長江南岸的一個小鎮——李莊。

梁思成在一封信裡說：「這次的遷移使我們非常沮喪，這意味著我們將要和認識十年的一群老友分離。我們將到一個除了中央研究院的研究所以外，遠離任何其他機關、遠離任何大城市的一個全然陌生的地方。而聯合大學將留在昆明，老金、端升、奚若和別人也將如此。不管我們逃到哪裡，我們都將每月用好多天、每天用好多小時，打斷日常的生活，打斷工作、進餐和睡眠來跑警報。」





潮濕的李莊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底，林徽因帶著兩個孩子還有母親乘坐一輛卡車離開昆明，前往李莊。車上有三十一個人，從剛出生的嬰兒到七十多歲的老人都有，大家擠滿了敞篷卡車。林徽因形容：「裝載著老的少的，在仲冬天氣裡過大山。」

大約走了兩個星期，他們才到達李莊，而梁思成由於臨行前突然發燒，只好一個人留在昆明，三個星期後才到達。

李莊與外界的唯一聯繫是河船，沒有電話、沒有電，也沒有車子或驢子，非常閉塞、落後。林徽因一家住在營造學社李莊的總部，是一幢普通的農舍。林徽因家前面的院子裡種著許多竹子，後面的院子裡種著高大的樟樹，有這樣的前後兩個院子。林徽因的家顯得非常幽靜。但是這裡非常潮濕，而且老鼠、蚊子、臭蟲，一樣都不少。這對在昆明時期就一直身體欠佳的林徽因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果然，在李莊不到一個月，林徽因的肺病復發，連續幾個星期高燒四十度。李莊是一個普通的小鎮，醫療衛生條件很差，梁思成只好買些藥來，自己給林徽因打針，但當時沒有治療肺結核的特效藥，林徽因的病一直得不到很好的治療，她的病情越來越嚴重，經常臥床不起，吃得也很少，日益消瘦下來。在李莊的這幾年，林徽因大部分時間都是躺在帆布床上度過的。

為了減輕林徽因的負擔，他們雇了一個保姆。林徽因用半是幽默半是無奈的口氣說：

我們很幸運，現在有了一個農村女傭，她人好，可靠，非常年輕而且好脾氣，唯一缺點是精力過盛。要是你全家五口只有七個枕套和相應的不同大小和質地的床單，而白布在市場上又和金箔一樣的難得，你就會在看到半數的床單和兩個枕套在一次認真的洗滌之後成了布條，還有襯衫一

半的扣子脫了線，舊襯衫也被揉搓得走了形而大驚失色。這些襯衫的市價一件在四十美元以上。在這個女傭手裡，各種家用器皿和食物的遭遇都是一樣的。當然我們盡可能用不易打碎的東西，看來沒有什麼是不會碎的，而且貴得要命或無法替換……

他們的生活越來越貧困，梁思成在給費慰梅的信中說：

我們目前的生活狀況，是你們難以想像的：在菜籽油燈的微光下，縫著孩子的布鞋，買便宜的粗食回家煮，過著我們的父執輩少年時期過的粗簡生活，但又做著現代的工作。有時閱讀外國雜誌，看到現代化設施的彩色廣告，宛如面對奇蹟。昆明的氣候和景色十分怡人，我們很喜歡。四川就很糟糕。我們住在長江上游一條不太吸引人的支流旁。南遷以來，辦公室人員增加了一倍，而我能籌到的資金，比過去兩年中所得到的還要多。我的工資只夠家人吃，但能過這樣的好日子，我們已經很滿意。我那迷人的病妻，因為我們仍能不動搖做我們的工作而感到寬慰。

梁再冰也曾經說：

更使父親傷腦筋的是，此時營造學社沒有固定經費來源。他無奈只得年年到重慶向「教育部」請求資助，但「乞討」所得無幾，很快地就會被通貨膨脹所抵消。抗戰後期物價上漲如脫韁之馬，父親每月薪金到手後如不立即去買油買米，則會迅速化為廢紙一堆。食品愈來愈貴，我們的飲食也就愈來愈差，母親吃得很少，身體日漸消瘦，後來幾乎不成人形。為了略微變換伙食花樣，父親在工作之餘不得不學習蒸饅頭、煮飯、做菜、醃菜和用桔皮做果醬等等。

家中實在無錢可用時，父親只得到宜賓委託商行去當賣衣物，把派克鋼筆、手錶等「貴重物品」都「吃」掉了。父親還常開玩笑地說：「把這只表『紅燒』了吧！這件衣服可以『清燉』嗎？」

梁從誠回憶說：

李莊的生活確實是艱難的。家裡唯一能給母親養病用的「軟床」是一張搖搖晃晃的帆布行軍床；晚上，為了父親寫書和我們姐弟倆做功課，全家點兩盞菜籽油燈，當時，連煤油燈都是過於「現代化」的奢侈品。記得我在這裡讀小學時，除了冬天外婆親手做的一雙布鞋外，平時都只能穿草鞋。偶爾有朋友從重慶或昆明帶來一小罐奶粉，就算是母親的難得營養品了。父親愛吃甜食，但這裡除了土製紅糖之外沒有別的。父親就把土糖蒸熟消毒，當成果醬抹在饅頭上，戲稱之為「甘蔗醬」。整個李莊沒有一所醫院，沒有一位正式醫生，沒有任何藥品。家裡唯一的一支體溫計被我失手打破，大半年母親竟無法量體溫。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她的病情一天天沉重，卻得不到像樣的治療。眼看著她消瘦下去，眼窩深陷，面色蒼白，幾個月的工夫，母親就失掉了她那一向煥發美麗的面容，成了一個憔悴、蒼老、不停的咳喘的病人。

此外，他們的這種極其貧困的生活還可以從費慰梅那兒瞭解到。據費慰梅說，他們收到的林徽因和梁思成寄來的信，信紙多半是薄薄的、泛黃發脆的，可能是從街上帶回來，包過菜和肉的。而且每次信紙都寫得密密麻麻，說明他們連買信紙的錢都沒有。

不止是家庭的貧窮讓林徽因苦惱，同母親的不和也讓她感到了生活的苦悶。林徽因在信中说：「我自己的母親碰巧是個極其無能又愛管閒事的女人，而且她還是天下最沒耐性的人。剛才這又是為了女傭人。真正的問題在於我媽媽在不該和女傭生氣的時候生氣，在不該慣著她的時候慣著她，還有就是過於沒有耐性，讓女傭人像鐘錶一樣地做好日常工作但又必須告誡她改變我的指令，如此等等——直到任何人都不能做任何事情。我經常和媽媽爭吵，但這完全是傻冒和自找苦吃。」

對此，金岳霖在給費正清的一封信中運用他那邏輯學家和哲學家的頭腦做了透徹的分析，他說：「我認為，相對於調整人際關係的困難來說，住房問題就是小事一樁。最難適應的是媽媽。她屬於完全不同的一代人，卻又生活在一個比較現代的家庭中，她在這個家庭中主意很多，也有些能量，可是完全沒有正經事可做，她做的只是偶爾落到她手中的事。她本人因為非常非常寂寞，迫切需要與人交流，她唯一能夠與之交流的人就是徽因，但徽因由於全然不瞭解她的一般觀念和感受，幾乎不能和她交流。其結果是她自己和自己的女兒之間除了爭吵以外別無接觸。她們彼此相愛，但又相互不喜歡。我曾經多次建議她們分開，但從未被接受，現在要分開已不大可能。」

對於家裡的人，林徽因說道：「思成是個慢性子，願意一次只做一件事，最不善處理雜七雜八的家務。但雜七雜八的事卻像紐約中央車站任何時候都會到達的各線火車一樣衝他駛來。我也許仍是站長，但他卻是車站！我也許會被碾死，他卻永遠不會。老金（正在這裡休假）是那樣一種過客，他或是來送客，或是來接人，對交通略有干擾，卻總能使正常車站更有趣，使站長更高興些。」

根據中央研究院本來的意思，他們希望李莊能成為學者們不受干擾、安心工作的避風港，但是，「在中國的任何角落也沒有人能夠遠離戰爭」。林徽因說：「儘管我百分之百地肯定日本鬼子絕對不會往李莊這個邊遠小鎮扔炸彈，但是，一個小時之前這二十七架從我們頭頂轟然飛過的飛機仍然使我毛骨悚然——有一種隨時都會被炸中的異樣恐懼。它們飛向上游去炸什麼地方，可能是宜賓，現在又回來，仍然那麼狂妄地、帶著可怕的轟鳴和險惡的意圖飛過我們的頭頂。我剛要說這使我難受極了，可我忽然想到，我已經病得夠難受了，這只是一時讓我更加難受，溫度升高、心跳不舒服地加快……眼下，在中國的任何角落也沒有人能遠離戰爭。不管我們是不是在進行實際的戰鬥，也和它分不開了。」

而這時，他們得知寄存在天津銀行的那些珍貴的建築資料被大水淹沒，這種沉重的打擊讓林徽因失聲痛哭。那些資料太珍貴了，是林徽因和梁思成用心血換來的，而今卻因為戰爭毀於一旦！

世事艱難。然而無論條件多麼艱苦，生活多麼貧困，不論有多少事惹人煩惱，林徽因都以頑強的毅力支撐著自己，支撐著這個家庭。精神稍微好一些，身體的病痛稍微減輕一些，她就從躺著的帆布床上起身，幫著做一些家務，輔導一下孩子的學習。為了能讓梁再冰學好英語，她以《木偶奇遇記》為課本，教她閱讀、朗誦，由於課程十分有趣，梁再冰學習的興趣很濃，英語有了很大進步。

此外，一有時間，林徽因自己也在讀書，梁思成帶回家一些書，林徽因就躺在床上看。在這段時間裡，她不但讀了《戰爭與和平》、《通往印度之路》、《北京清代宮殿》、《元朝宮殿》、《莎士比亞全集》等著作，對學術研究的興致也很高。對於費慰梅

正在從事的漢墓和其拓片的研究，林徽因很感興趣。據梁思成說：

或許你到現在還不知道，她自己也在探索過漢代歷史。她私下曾很認真地弄熟了漢代的著名人物，帝王和王后，將軍和大臣，他們的寵幸和敵人，她一提起漢代人，簡直像在談論隔壁家要好的朋友！這還不打緊，她把他們的習慣、服裝、建築，甚至性情都牽連成一線。若按現在的的速度做下去，她遲早會成為漢朝研究的專家。即使現在病成這個樣子，她還能有聲有色地講那些西漢的人物典故。

那些壁畫描繪的是生活實景，她打算從漢代歷史中，把和壁畫有關的引用句，抄一份給你參考。漢代人似乎特別喜歡往牆上或屏風上畫畫，她對此做了許多記錄。她甚至認為漢朝人畫畫的本領，比我們在那個時期的石刻上或浮雕上看到的還要高明。把圖畫刻在石頭上，有時必須採用建築上的表現手法，把人畫胖點，形態不那麼細緻，特別是淺浮雕。從你那些拓片複製品上，我們可以看到描繪動態的馬、狗的漂亮素描，想像一下，如果這些素描用畫筆畫在漢朝的皇宮牆壁上，那會是什麼景象？

老金也說：「『她全身都浸泡在漢朝裡了，不管提及任何事物，她都會立刻扯到那個遙遠的朝代去，而靠她自己是永遠回不來的。』也許正是這種精神上的追求幫助了他們在物質極端匱乏的情況下渡過難關。」

一九四三年春，林徽因、梁思成一家迎來了一位英國客人——英國生物化學家、英國駐重慶大使館戰事科學參贊李約瑟教授。為了不讓遠道而來的客人失望，儘管林徽因需要臥床靜養，但還是和梁思成一起非常熱情地招待了他，跟他親切交談，

讓他感到非常滿意、非常愉快。這對戰時連溫飽問題都不容易解決的夫妻，盡了自己的最大的努力，來招待一位外國友人。林徽因對費慰梅說：「李約瑟教授剛來過這裡，吃夠了炸鴨子，已經走了。開始時人們打賭說李教授在李莊時根本不會笑。我承認李莊不是一個會讓客人過度興奮的地方，但我們還是有理由期待一個在戰爭時期不辭辛苦地為了他所熱愛的中國早期科學而來到中國的人會笑一笑。終於，在這位著名教授和梁先生及夫人（當時臥病在床）見面時露出了笑容。他說他非常高興，因為梁夫人的英語竟有愛爾蘭口音。而我從不知道英國人對愛爾蘭還有如此好感。據說最後一天下午，在中央博物院的院子裡受到茶點招待時他更為活躍。可見英國人愛茶之甚。」

得知朋友在陷入戰爭災難的中國生活艱難，遠在美國的費慰梅夫婦幾次寫信勸林徽因和梁思成去美國，那兒有良好的醫療條件，優良的工作環境，優厚的工作報酬。可是他們婉言謝絕了。梁思成在回信中說：「我的祖國正在災難中，我不能離開她；假如我必須死在刺刀或炸彈下，我要死在祖國的土地上。」

對於後來有人指責梁思成困守李莊，加重了林徽因的病情，梁思成說：「我當然知道這個決定所付出的代價，我不能不感謝徽因，她以偉大的自我犧牲來支持我。不！她並不是支持我，我認為這也是她的選擇。如果說我從李白、杜甫、岳飛、文天祥這些偉大的民族英雄那裡繼承了愛國主義思想，而徽因則除此之外，比我更多地從拜倫、盧梭等偉大的詩人、哲學家那裡學習了反侵略、反壓迫的精神。她對祖國的愛，是懷著詩人般的浪漫主義色彩的。後來有朋友責備我，說我的選擇使得徽因過早去世了。我無言以答。但我們都沒有後悔，那個時候我們急急忙忙地向前走，很少回顧。今天我仍然沒有後悔。」

梁思成和林徽因共同的心聲，也是那個時代愛國的知識分子共同的心聲。他們在中國最危難的日子裡，誓死與中國共存亡。

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一年，日本侵略者對成都、重慶進行狂轟濫炸，炸毀房屋無數，炸死中國數萬中國民眾。日本的野蠻侵略行徑激怒了中國的飛行員，他們紛紛請戰抗敵。林徽因的三弟林恆和他們熟識的那八位飛行員都駕機參戰，但先後都壯烈犧牲了。林恆是航空學院成績名列第二的優秀學員，在一九四一年三月成都的一次空戰中，擊落一架日機後，自己也被擊中頭部，壯烈殉國。老金說：「他得到了自己選擇的事業，完成了他的使命，他是死得其所。」

梁思成專程到成都去為他辦理喪事。儘管是在病中，林徽因勇敢地面對了這一悲慘的消息，三年後為了哀悼弟弟和其他八個「兄弟」，她寫了〈哭三弟恆——三十年空戰陣亡〉：

弟弟，我沒有適合時代的語言
來哀悼你的死；
它是時代向你的要求，
簡單的，你給了。
這冷酷簡單的壯烈是時代的詩
這沉默的光榮是你。

假使在這不可免的真實上
多給了悲哀，我想呼喊，
那是——你自己也明瞭——
因為你走得太早，
太早了，弟弟，難為你的勇敢，
機械的落伍，你的機會太慘！

三年了，你陣亡在成都上空，
這三年的時間所做成的不同，
如果我向你說來，你別悲傷，

因為多半不是我們老國，
而是他人在時代中輟動，
我們靈魂流血，炸成了窟窿。

我們已有了盟友、物資同軍火，
正是你所曾經希望過。
我記得，記得當時我怎樣同你
討論又討論，點算又點算，
每一天你是那樣耐性地等著，
每天卻空的過去，慢得像駱駝！

現在驅逐機已非當日你最理想
駕駛的「老鷹式七五」那樣——
那樣笨，那樣慢，啊，弟弟不要傷心，
你已做到你們所能做的，
別說是誰誤了你，是時代無法衡量，
中國還要上前，黑夜在等天亮。

弟弟，我已用這許多不美麗言語
算是詩來追悼你，
要相信我的心多苦，喉嚨多啞，
你永不會回來了，我知道，
青年的熱血做了科學的代替；
中國的悲愴永沉在我的心底。

啊，你別難過，難過了我給不出安慰。
我曾每日那樣想過了幾回：
你已給了你所有的，同你去的弟兄
也是一樣，獻出你們的生命；

已有的年輕一切；將來還有的機會，
可能的壯年工作，老年的智慧；

可能的情愛，家庭，兒女，及那所有
生的權利，喜悅；及生的糾紛！
你們給的真多，都為了誰？你相信
今後中國多少人的幸福要在
你的前頭，比自己更緊；那不朽
中國的歷史，還需要在世上永久。
你相信，你也做了，最後一切你交出。
我既完全明白，為何我還為著你哭？
只因你是個孩子卻沒有留什麼給自己，
小時我盼著你的幸福，戰時你的安全，
今天你沒有兒女牽掛需要撫恤同安慰，
而萬千國人像已忘掉，你死是為了誰！

無法抑制的沉重悲痛，化作擲地有聲的詩句，帶給人震撼心靈的力量。這首詩不只是寫給林恆一個人的，而是獻給抗戰時期林徽因認識的所有的以身殉國的飛行員朋友的。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林徽因對民族命運的憂思和對統治當局的責難。這是一位親人的控訴和紀念，也表達了一位中國知識分子對人民對國家的忠誠。



一九四二年八月，費正清來到重慶的美國大使館任職。林徽因和梁思成知道後非常高興，天天盼望他能到李莊來。十一月中旬，費正清在社會學家陶孟和的陪伴下來到李莊看望他的老朋友。他在路上感染了呼吸道病菌，一到李莊便發燒，連續躺了好幾天才好，他的病床和林徽因的只有一廳之隔，梁思成為了侍候兩個病人不得不在兩張病床之間來回跑來跑去。費正清在李莊一待了一個星期，親眼看見了在戰爭年代，中國傑出的學者在病痛和貧困的折磨下，如何一如往常地從事學術研究和專注於自己的事業。

他在《費正清對華回信錄》中動情地寫道：

林徽因非常消瘦，但在我做客期間，她還是顯得生氣勃勃，像以前一樣，凡事都由她來管，別人還沒有想到的事，她都先行想到了。每逢進餐，都吃得很慢；餐後我們開始聊天，趣味盎然，興致勃勃，徽因最為健談。傍晚五時半便點起了蠟燭，或是近似植物油燈一類的燈具，這樣，八時半就上床了。沒有電話，僅有一架留聲機和幾張貝多芬、莫扎特的音樂唱片；有熱水瓶而無咖啡；有許多件毛衣但多半不合身；有床單但缺少洗滌用的肥皂；有鋼筆、鉛筆但沒有供書寫的紙張；有報紙但都是過時的。……

我逗留了一個星期，其中不少時間是由於嚴寒而躺在床上。我為我的朋友們繼續從事學術研究工作和所表現出來的堅韌不拔的精神而深受感動。依我設想，如果美國人處在此種境遇，也許早就拋棄書本，另謀門道，改善生活去了。但是這個曾經接受過高度訓練的中國知識界，一面接受了原始純樸的農民生活，一面繼續致力於他們的學術研究事業。

這是那一代知識分子的肖像，覺醒的一代知識分子希望以文化復興來帶動整個中華民族的復興。以這種內在理念為支撐，他們把文化事業當做自己安身立命、報效祖國的途徑。不管時代多麼艱難，他們從未忘記自己的歷史責任，為學術、文化的薪火相傳費盡了自己的心血。六十年前的血性、激情和責任感成為我們這個災難的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永遠激勵著後人。

費正清此行給林徽因帶來了精神上的安慰和物質上的幫助。由於他送的奶粉和一些有營養的食物，林徽因的病情有所好轉。這年年底，她給費正清的信中說：「不發燒、不咳嗽、沒有消化不良，睡眠和胃口都好，又有好的食物和克寧奶粉。」

林徽因還特地為她的床打一副架子，架子把床抬高了，「接近人類的高度，而不是接近地面，別人拿東西給我時就不必彎腰鞠躬了」。至於自己的孩子，雖然他們是林徽因生活中的重要角色，但在給費慰梅的信中，她很少提到他們。但有一封信很形象地描繪了這一對可愛的兒女的情況：

再冰繼承了思成的溫和和我的優點。她在學校裡學習和交友的成績都非常出色。她容光煥發的笑容彌補了她繼承自父母的缺乏活力……另一方面，從誠現在已長成一個曬得黝黑的鄉村小伙子，腳上穿著草鞋。他能操一口地道的四川話，和粗野的本地同學打交道。但在家裡他倒像個小紳士，非常關心我的健康，有時專心製作各種小玩意兒。

我繼續扮演著經濟絕招的「雜耍演員」，讓全家、幾個親戚和同事多少得到一點好的照顧。我忙著為思成和兩個孩子縫補那些幾乎補不了的內衣和襪子……直到實在做不下去時，連小弟在星期天下午也加入縫補的行列。這比寫一整

章關於宋、遼、清的建築變遷或描繪宋朝都城還要費勁得多。在思成忙著寫作時，我曾經替他的書稿做種種補充、修改，潤色文字。實實一切都好，但她要走這麼遠的泥濘路去上學，可真難為了她，而且她中午老是吃不飽。

梁從誠回憶當年的情景時說：

李莊的四年，大概仍是母親情緒上最抑鬱的時期。戰爭和疾病無情地擊倒了她，而這裡又是那樣一個偏僻、單調的角落。老朋友們天各一方，難得有一兩封書信往還。可以想像，她的心境有時是多麼悲涼。但病中的母親這時更勤奮於學習。她在病榻上讀了大量的書。我和姐姐至今還能舉出不少當時她讀過的書名，這是因為當時她常常讀書有感卻找不到人交談，只好對著兩隻小牛彈她的琴。這時期，她讀了許多俄羅斯作家的作品，我記得她非常喜歡屠格涅夫的《獵人日記》，而且要求我也當成功課去讀它（那時我只有十二歲），還要我們一句句地去體味屠格涅夫對自然景色的描寫；米開朗其羅傳，因為是英文的，我們實在沒法子讀，她就讀一章，給我們講一章，特別詳細地為我們描述了米開朗其羅為聖彼得教堂穹頂作畫時的艱辛。講的時候很動感情，可能因為米開朗其羅那樣對藝術的執著追求特別引起了她的共鳴。

她偶爾也還寫詩，但流露的大多是惆悵。在她興致好的時候，間或喜歡讓我和姐姐坐在床前，輕輕地為我們朗讀她舊日的詩、文，她的詩本來講求韻律，比較「上口」，由她自己讀出，那聲音真是如歌。她也常常讀古詩詞，並講給我們聽，印象最深的，是她在教我讀到杜甫和陸游的「劍外忽傳收蓟北」，「家祭無忘告乃翁」，以及「可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等名句時那種悲憤、憂愁的神情。

母親非常擅長朗誦。我記得，還在昆明時期，我大概只是小學二年級，她教我〈唐雎不辱使命〉，自己讀給我 and 姐姐聽。一篇古文，被她讀得繪聲繪色：唐雎的英雄膽氣，秦王前倨而後恭的窘態，聽來簡直似一場電影。五十年過去了，我仍覺得聲聲在耳，歷歷在目。在李莊時，她從中研院歷史語言所借到過幾張勞倫斯·奧列佛的莎劇台詞唱片，非常喜歡，常常模仿這位英國名演員的語調，大聲地「耳語」：“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於是父親、姐姐和我就熱烈鼓掌……她這位母親，幾乎從未給我們講過什麼小白兔、大灰狼之類的故事，除了給我們買了大量的書要我們自己去讀之外，就是以她自己的作品和對文學的理解來代替稚氣的童話，像對成年人一樣地來陶冶我們幼小的心靈。

林徽因身體稍好一點，就急不可待地讀書、工作。從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四年，林徽因和莫宗江、盧繩等人一起，參加了由梁思成總負責的《中國建築史》的撰寫工作。寫一本《中國建築史》是林徽因、梁思成的夙願，在寫作分工中，林徽因撰寫第七章宋、遼、金部分，並對整部書稿做了校對和補充。

林徽因寫作的具體內容是：北宋的都市宮殿苑囿以及寺觀、遼的都市以及宮殿、金的都市宮殿和佛寺。林徽因寫的字數雖然只有一點五萬多字，但資料豐富，她所引證的資料和有關書籍有五十多種，加上她與梁思成通過野外考察所得的第一手資料，在當時應該是最權威，最全面的，而且文章論證嚴密、紮實，頗具學術功底。在戰爭年代，外在環境如此惡劣，自己的身體狀況又經常處於危險狀態，能以百倍的毅力，寫出如此資料紮實、論證如此精闢的文字，實在是難能可貴。

在林徽因的支持下，梁思成還在一九四四年用英文撰寫了《中國建築史圖錄》一書。林徽因在給費正清的信中說：「思成有一個想法，把一些關於中國建築的圖版做成黑白片子，加上中英文解說，完成後送到你那裡製成縮影膠卷，寄到美國出版或另找出版補助。英文文字部分隨後付印，中文文字則在中國印製。這樣，我們的一兩套著作就可以在戰爭結束之前或戰爭剛結束時上市。如此以來，這裡的同仁就有了新的希望。或者當作下一年度工作的目標。最近有不少單位寫信來，問我們有沒有出版新的中國建築刊物。看來，以前我們沒把印刷的問題解決，真是可惜。」

這段時期，梁思成為了完成他的繪圖，不得不徹夜工作。在菜籽油昏黃的燈光下，林徽因和梁思成忘我地工作著。由於梁思成的脊椎灰質化病常常折磨得他抬不起頭來，他身穿鋼馬甲，下巴支在一個花瓶上，伏案作圖，為的是利用花瓶的支撐，減輕脊椎的重負，畫圖時，梁思成要不斷地調節花瓶的位置，其艱難可想而知。臥病在床的林徽因，則是在身體好一點時便半坐在床上，翻閱二十四史和各種資料典籍，為書稿做種種補充、修改和潤色。

他們的這種堅毅的精神深深地感動了費正清，他高度評價說：「他們都已成了半殘的病人，卻仍在不顧一切的，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致力於學術研究。在我們的心目中，他們是不怕艱難，獻身科學的崇高典範。不論是疾病還是艱難的生活都絲毫沒有影響他們對自己創造性研究工作的熱情。他們不僅具有極高的學術水平，而且還有崇高的品德修養，而正是後者使他們能夠始終不渝的堅持自我犧牲，堅定的為中國的現代化作出了自己的一份貢獻。」

這是對他們恰如其分的評價。戰爭時期大後方艱苦、黯淡的生活，腐蝕了許多年輕人的意志，使他們動搖、彷徨，想放棄學

術研究，不再做窮知識分子，而是一心想著去生官發財。林徽因對這種現象感到悲憤，她寫出了唯一的一首政治詩〈刺耳的悲歌〉。據說在詩中，她以悲愴的筆調抨擊了那些看見別人做了官、發了國難財就眼紅的年輕人，也抨擊了政府騙取年輕人的愛國熱情，徵召他們去參加目的可疑的什麼「青年軍」，但可惜的是，這篇詩稿並沒有流傳下來。

林徽因在李莊的最後兩年中心情非常不好，十分消沉，梁從誠回憶說：「這並不僅僅是自身病痛所致，更多的，也許還是出於『長安不見』的憂愁。她這時愛讀杜、陸後期的詩詞，不是偶然的。在她和父親身上，常表現出中國漢族讀書人的那種傳統的『氣節』心理。一九四六年，抗戰已經勝利，有一次我同母親談起四四年日軍攻佔貴州獨勻，直逼重慶的危局，我曾問母親，如果當時日本人真的打進四川，你們打算怎麼辦？她若有所思地說：『中國唸書人總還有一條後路嘛，我們家門口不就是揚子江嗎？』我急了，又問：『我一個人重慶上學，那你們就不管我啦？』病中的母親深情地握著我的手，彷彿道歉似地小聲說：『真要到了那一步，恐怕就顧不上你了！』聽到這個回答，我的眼淚不禁奪眶而出。這不僅是因為自己感到受了『委屈』，更多地，我確是被母親以最平淡的口吻所表現出來的那種凜然之氣震動了。我第一次忽然覺得她好像不再是『媽媽』，而變成了一個『別人』。」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底，梁思成到達重慶，費正清寫道：「思成昨晚第一次來，看到他的《中國建築史》圖稿的縮影膠卷，當場很興奮。小伙子們特別喜歡拍它，因為效果極佳。思成的體重只有四十七公斤，每天和徽因工作到半夜。寫成十一萬字的《中國建築史》，他已透支過度。但他和往常一樣精力充沛和雄心勃勃，並維持著在任何情況下都像貴族那樣的高貴和斯文。」對事業、對祖國的無比熱愛讓他們充滿活力，讓他們堅強高貴。



遠離故土的相聚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侵略者宣佈無條件投降。消息傳到重慶，全城人民跑上街頭，歡呼著表達勝利的喜悅，這時梁思成正在重慶，和費慰梅、費正清以及其他友人一起歡慶勝利。在眾人都興高采烈的時候，費慰梅看到梁思成突然顯得有些寂寞，她想，「一直等了八年，可是勝利到來的時候他卻不在家」。八年，對於梁思成和林徽因來說，實在是漫長的一段時間。因此，梁思成、費慰梅立即決定乘坐飛機趕往李莊，和林徽因以及家人一起慶祝這盼望已久的勝利的到來。

很快地，費慰梅看到了她分別已久的朋友，費慰梅說：「徽因躺在床上，蒼白、瘦削，宛如她那首〈靜坐〉詩：『一條枯枝影，青煙色的瘦細。』但她的精神很好，笑吟吟地看著我。我們長談許久，相互訴說一別多年，彼此生活中發生的事。她經歷的生活艱辛和病痛，使她看事情的角度和感覺都變得更深刻。我開始在想，回顧我們在北京認識的那些中國知識分子的生活，過去他們對中國實際問題的接觸，其實和我們外國人一樣的遙遠。而今，我彷彿看到世上所有生命的終場，想到了生命的短暫與偶然。」

林徽因慶祝勝利的方式是坐轎子晃呀晃地到茶鋪去喝茶，而費慰梅則在一旁跟著走。這是五年來她第一次上街，街上的景象讓林徽因感到有些驚奇，新的景象、新的聲音、新的面孔，夠她回家咀嚼幾個星期。

在此後的日子裡，每天只要有可能，林徽因都要寫點東西，有時是關於建築，有時是關於漢代歷史，她還構思一本小說。她的精神狀態還不錯，只是感到寂寞。在給費慰梅的信中她說：「你無法想像，你走了以後，這裡有多麼寂寞。你在這院子裡的時候，我們多麼快樂啊！」她跟費正清說：

告訴慰梅，上個星期天我又坐轎子進城，還坐上再冰的兩個朋友用篙撐的船，在一家飯館吃了麵，又在另一家茶鋪休息，回來途中經過足球場，在河邊的茶棚裡看了一場排球賽。

前一天我還去了再冰的學校，穿了休閒服，非常漂亮，還引起了轟動！但現在那難得的陽光日子消逝了、被遺忘了。這星期的天氣灰而多雨，看起來似乎不像是真的。

如果太陽能再露臉，而我身體又能恢復到像樣的程度，不管天氣冷不冷，哪怕就為了好玩，也要冒險到重慶去。我已經把我的衣服整理好、縫補好，準備動身。當氣氛適合的時候，我收拾行裝來找你應該沒問題。但天一直在下雨……而且也沒有船。顯然從你美國來到中國要比我們從這裡去到重慶容易得多。

「就為了好玩」，天氣好，而且有了船，她便和梁思成一塊兒來到重慶。這是五年來她第一次離開李莊。她的健康狀況如此不穩定，在重慶的大部分時間只能待在中央研究院招待所宿舍裡。有時費慰梅駕著吉普車帶她出去玩，她坐在吉普車上，視線離不開途中看到的新衣服、車流和重慶的市井生活。她覺得每一件事都很新鮮有趣。有好幾次，費慰梅駕著吉普車帶她到美國大使館餐廳用餐。她很喜歡那些曾在各處打仗的穿軍服的美國武官，很快加入他們的談話中，這是她第一次和美國盟軍談話。對她來說，戰爭就是一連串和日本敵人不期而遇的悲慘經歷。

林徽因還到費慰梅夫婦在重慶美國新聞處分到的一處新居，一進屋，林徽因說：「慰梅，你這裡，簡直像走進了雜誌裡！」過去幾年，壁爐和燈罩林徽因都已經很陌生了，只是偶爾在雜

誌上看到。林徽因身體好的時候，費慰梅還帶她和梁思成去看過幾場電影和戲劇。在這裡，林徽因和兒子梁從誠參加了喬治·馬歇爾將軍在重慶美國新聞處舉行的一次招待會。在這個晚會上，林徽因生平第一次見到了周恩來和馮玉祥等人。費慰梅說：「她更注意的是共產黨的領袖們。他們是從另一個星球上來的客人。關於他們，她從國民黨那裡聽到讀到的除了邪惡沒有別的——然而在這一環境下，他們和別人一樣都是人。」

當時，美國著名的胸腔外科醫生李歐·艾婁塞在重慶中國善後救濟總署服務，他聽說林徽因長期患肺病後，慨然答應到招待所去看望她。在用聽診器做了簡單的檢查和詢問了病情之後，艾婁塞告訴費慰梅，他斷定她兩片肺和一個腎已經感染，最多只能再活五年。林徽因沒有問，費慰梅也沒有告訴她，費慰梅想，這些林徽因應該都知道。

此後不久，梁思成返回李莊處理營造學社的一些事情，而林徽因則帶著母親和兒女，以及女僕跟費慰梅乘飛機來到昆明。她和家人先是在張奚若家裡住了幾天，後來住在軍閥唐繼堯後山上的祖居裡。在這裡她又見到了分別已久的老朋友金岳霖、錢端升、沈從文等人，重逢的喜悅讓林徽因暫時忘記了自己的病痛，「這次重逢所帶給我的喜悅，甚至超過我一個人在李莊時的最大的奢望。」她說：

我終於又來到了昆明！我來這裡是為三件事，至少有一樁總算徹底實現了。你知道，我是為了把病治好而來的。其次，是來看看這個天朗氣清、薰風和暢、遍地鮮花、五光十色的城市。最後並非最無關緊要的，是同我的老朋友們相聚，好好聊聊。前兩個目的還未實現，因為我的病情並未好轉，甚至比在重慶時更厲害了——一到昆明我就臥床不起。但最後一樁我享受到的遠遠超過我的預想。幾天來我所過的是真

正舒暢而愉快的日子，是我獨自住李莊時所不敢奢望的。

我花了十一天的工夫才充分瞭解到，處於特殊境遇的朋友們在昆明是怎樣生活的，加深了我們久別後相互之間的瞭解。那種使我們得以相互溝通的深切的愛和理解卻比所有的人所預期的都更快的重建起來。我們用兩天時間交談了各人的生活狀況、情操、思想和學術狀況。也暢敘了各自對國家大事的看法，還談了個人家庭經濟，以及前後方個人和社會狀況，儘管談得漫無邊際，我們幾個人（張奚若、錢端升、老金和我）之間，也總有著一股相互信任和關切的暖流。更不用說，忽然能重聚的難忘時刻，所給予我們每個人的喜悅和激奮。

直到這時我才明白，當那些缺少旅行工具的唐宋時代詩人們在遭貶謫的路上，突然在什麼小客棧或小船中或某處由和尚款待的廟裡和朋友不期而遇時的那種快樂，他們又會怎樣在長談中推心置腹！

我們的時代也許和他們不同，但這次相聚卻很相似。我們都老了，都有過貧病交加的經歷，忍受漫長的戰爭和音信的隔絕，現在又面對著偉大的民族奮起和艱難的未來。

此外，我們是在遠離故土，在一個因形勢所迫而不得不住下來的地方相聚。渴望我們曾度過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的地方，就如同唐朝人思念長安、宋朝人思念汴京一樣。我們遍體鱗傷，經過慘痛的煎熬，使我們身上出現了或好或壞或別的什麼新品質。我們不僅體驗了生活，又受到了艱辛生活的考驗。我們的身體受到了嚴重的損傷，但我們的信念如故。現在我們深信，生活中的苦與樂其實是一回事。

在張奚若家休息幾天之後，林徽因一家搬到張奚若為她們安排的唐家花園。林徽因描述道：

所有美麗的東西都在守護著這個花園，如洗的碧空、近處的岩石和遠處的山巒……這是在這所新房子的第十天。這房間寬敞、窗戶很大、使它有一種如戈登·克雷早期舞台設計的效果。甚至午後的陽光也像是聽從他的安排。幻覺般地讓窗外搖曳的枝樹枝椏緩緩移動的影子映灑在天花板上！……

這裡的海拔或是什麼別的對我非常不利，弄得我喘不過氣來，常覺得好像剛剛跑了幾公里。所以我只能比在李莊時還更多地靜養。他們不讓我多說話，儘管我還有不少話要說。可是這樣的「談話」真有點辜負了那佈景。

在這麼幽靜的環境裡，林徽因在一片陽光中，做了情緒上的小小旅行：

放了假，春初的日子鬆弛下來。將午未午時候的陽光，澄黃的一片，由窗櫺橫浸到室內，晶瑩地四處射。我有點發怔，習慣地在沉寂中驚訝我的周圍。我望著太陽那湛明的體質，像要辨別它那交織絢爛的色澤，追逐它那不著痕跡的流動。看它潔淨地映到書桌上時，我感到桌面上平鋪著一種恬靜，一種精神上的豪興，情趣上的閒逸；即或所謂「窗明几淨」，那裡默守著神秘的期待，漾開詩的氣氛。那種靜，在靜裡似可聽到那一處王爭琮的泉流，和著彷彿是斷續的琴聲，低訴著一個幽獨者自娛的音調。看到同這一片陽光射到地上時，我感到地面上花影浮動，暗香吹拂左右，人隨著晌午的光霽花氣在變幻，那種動，柔諧婉轉有如無聲音樂，令人悠然輕快，不自覺地脫落傷愁。至多，

在舒揚理智的客觀裡使我偶一回頭，看看過去幼年記憶步履所留的殘跡，有點兒惋惜時間；微微怪時間不能保存情緒，保存那一切情緒所曾流連的境界。

倚在軟椅上不但奢侈，也許更是一種過失，有閒的過失。但東坡的辯護：「懶者常似靜，靜豈懶者徒」，不是沒有道理。如果此刻不倚榻而上「靜」，則方才情緒所兜的小小圈子便無條件地失落了去！人家就不可惜它，自己卻實在不能不感到這種親密的損失的可哀。

就說它是情緒上的小小旅行吧，不走並無不可，不過走走未始不是更好。歸根說，我們活在這世上到底最珍惜一些什麼？果真珍惜萬物之靈的人的活動所產生的種種，所謂人類文化？這人類文化到底又靠一些什麼？我們懷疑或許就是人身上那一撮精神同機體的感覺，生理心理所共起的情感，所激發出一串行為，所聚斂的一點智慧，——那麼一點點人之所以為人的表現。宇宙萬物客觀的本無所可珍惜，反映在人性上的山川草木禽獸才開始有了秀麗，有了氣質，有了靈犀。反映在人性上的人自己更不用說。沒有人的感覺，人的情感，即使有自然，也就沒有自然的美，質或神方面更無所謂人的智慧，人的創造，人的一切生活藝術的表現！這樣說來，誰該鄙棄自己感覺上的小小旅行？為壯壯自己膽子，我們更該相信惟其人類有這類情緒的馳騁，實際的世間才陸續著產生我們精神所寄托的文物精粹。

此刻我竟可以微微一咳嗽，乃至於用播音的圓潤口調說：我們既然無疑的珍惜文化，即尊重盤古到今種種的藝術——無論是抽象的思想的藝術，或是具體的駕馭天然材

料另創的非天然形象，——則對於藝術所由來的淵源，那點點人的感覺，人的情感智慧（通稱人的情緒），又當如何地珍惜才算合理？

但是情緒的馳騁，顯然不是詩或畫或任何其他藝術建造的完成。這馳騁此刻雖佔了自己生活的若干時間，卻並不在空間裡占任何一個小小位置！這個情形自己需完全明瞭。此刻它僅是一種無蹤跡的流動，並無棲身的形體。它或含有各種或可捉摸的質素，但是好奇地探討這個質素而具體要表現它的差事，無論其有無意義，除卻本人外，別人是無能為力的。我此刻為著一片清婉可喜的陽光，分明自己在對內心交流變化的各種聯想發生一種興趣的注意，換句話說，這好奇與興趣的注意已是我此刻生活的活動。一種力量又迫著我來把握住這個活動，而設法表現它，這不易抑制的衝動，或即所謂藝術衝動也未可知！只記得冷靜的杜工部散散步，看看花，也不免會有「江上被花惱不徹，無處告訴只癡狂」的情緒上一片紊亂！玲瓏煦暖的陽光照入面前，那美的感人力量就不減於花，不容我生硬地自己把情緒分割為有閒與實際兩種，而權其輕重，然後再決定取捨的。我也只有情緒上的一片紊亂。

情緒的旅行本偶然的事，今天一開頭並為著這片春初晌午的陽光，現在也還是為著它。房間內有兩種奢侈的光常叫我的心緒緊張如同花開，趁著感覺的微風，深淺零亂於冷智的枝葉中間。一種是燭光，高高的台座，長垂的燭淚，熊熊紅焰當簾幕四下時各處光影掩映。那種閃爍明艷，雅有古意，明明是畫中景象，卻含有更多詩的成分。另一種便是這初春晌午的陽光，到時候有意無意的大片子灑落滿室，那些窗櫺欄板几案筆硯浴在光霽中，一時全成了靜物

圖案；再有紅蕊細枝點綴幾處，室內更是輕香洋溢，叫人俯仰全觸到一種靈性。

這種說法怕有點會發生誤會，我並不說這片陽光射入室內需要筆硯花香那些儒雅的托襯才能動人，我的意思倒是：室內頂尋常的一些供設，只要一片陽光這樣又幽嫺又灑脫地落在上面，一切都帶上另一種動人的氣息。這裡要說到我最初認識的一片陽光。那年我六歲，記得是剛剛出了水珠以後——水珠即尋常水痘，不過我家鄉的話叫它做水珠。當時我很喜歡那美麗的名字，忘卻它是一種病，因而也覺到一種神秘的驕傲。只要人過我窗口問問出「水珠」麼？我就感到一種榮耀。那個感覺至今還印在腦子裡。也為這個緣故，我還記得病中奢侈的愉悅心境。雖然同其他多次的害病一樣，那次我仍然是孤獨地被囚禁在一間房屋裡休養的。那是我們老宅子裡最後的一進房子；白粉牆圍著小小院子，北面一排三間，當中夾著一個開敞的廳堂。我病在東頭娘的臥室裡。西頭是媽媽的住房。娘同媽永遠要在祖母的前院裡行使她們女人們的職務的，於是我常是這三間房屋唯一留守的主人。

在那三間屋子裡病著，那經驗是難堪的。時間過得特別慢，尤其是在日中毫無睡意的時候。起初，我僅集注我的聽覺在各種似腳步，又不似腳步的上面。猜想著，等候著，希望著人來。間或聽聽隔牆各種瑣碎的聲音，由牆基地下傳達出來又消斂了去。過一會，我就不耐煩了——不記得是怎樣的，我就躡著鞋，捱著木床走到房門邊。房門向著廳堂斜斜地開著一扇，我便扶著門框好奇地向外探望。

那時大概剛是午後兩點鐘光景，一張剛開過飯的八仙桌，

異常寂寞地立在當中。桌下一片由廳口處射進來的陽光，洩洩融融地倒在那裡。一個絕對消寂的周圍伴著這一片無聲的金色的晶瑩，不知為什麼，忽使我六歲孩子的心裡起了一次極不平常的振蕩。

那裡並沒有几案花香，美術的佈置，只是一張極尋常的八仙桌。如果我的記憶沒有錯，那上面在不多時間以前，是剛陳列過鹹魚、醬菜一類極尋常儉樸的午餐的。小孩子的心卻呆了。或許兩隻眼睛倒張大一點，四處地望，似乎在尋覓一個問題的答案。為什麼那片陽光美得那樣動人？我記得我爬到房內窗前的桌子上坐著，有意無意地望望窗外，院裡粉牆疏影同室內那片金色和煦絕然不同趣味。順便我翻開手邊娘梳妝用的舊式鏡箱，又上下搖動那小排狀抽屜，同那刻成花籃形的小銅鑿子，不時聽雀躍過枝清脆的鳥語。心裡卻仍為那片陽光隱著一片模糊的疑問。

時間經過二十多年，直到今天，又是這樣一洩陽光，一片不可捉摸，不可思議流動的又恬靜的瑰寶，我才明白那問題是永遠沒有答案的。事實上僅是如此，一張孤獨的桌，一角寂寞的廳堂。一隻靈巧的鏡箱；或窗外斷續的鳥語，和水珠——那美麗小孩子的病名——便湊巧永遠同初春沉靜的陽光整整復斜斜地成了我回憶中極自然的聯想。

一九四六年六月，林徽因、梁思成和家人又回到重慶，住在中央研究院招待所裡。跟西南聯大的許多教師和他們的家人擠在一起，等了一個多月後，才於七月三十一日乘坐一架重慶直飛北平的飛機，返回北平。

美麗的昆明留在了身後：「昆明永遠那樣美，不論是晴天還是雨天。我窗外的景色在雷雨前後特別動人。在雨中，房間裡有

一種難以名狀的浪漫氛圍——天空和大地突然一起暗了下來。
一個人在一個外面有個寂靜的大花園的冷清的屋子裡。這是一
個人一生也忘不了的。」

然而，戰爭卻沒有離開，戰爭所帶來的傷痛也沒有離開。

